

战争回忆录

戴高乐 著



第三卷 拯救

1944
—
1946

〔上〕

战争回忆录



第二卷

K565.46/1

战争回忆录

第三卷

拯救

1944—1946

上册

〔法〕戴高乐著
北京编译社译

830855

世界知识出版社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LE SALUT

1944—1946

Librairie Plon, Paris, 1959

根据巴黎普隆图书公司 1959 年法文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战争回忆录

第三卷

拯 救

1944—1946

〔法〕戴高乐著

北京编译社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 24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20.5 字数：449,000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2,000

书号：3003·1623 定价：(上、下二册) 1.90 元



1945 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



戴高乐将军和戴高乐夫人。



1945年，大选前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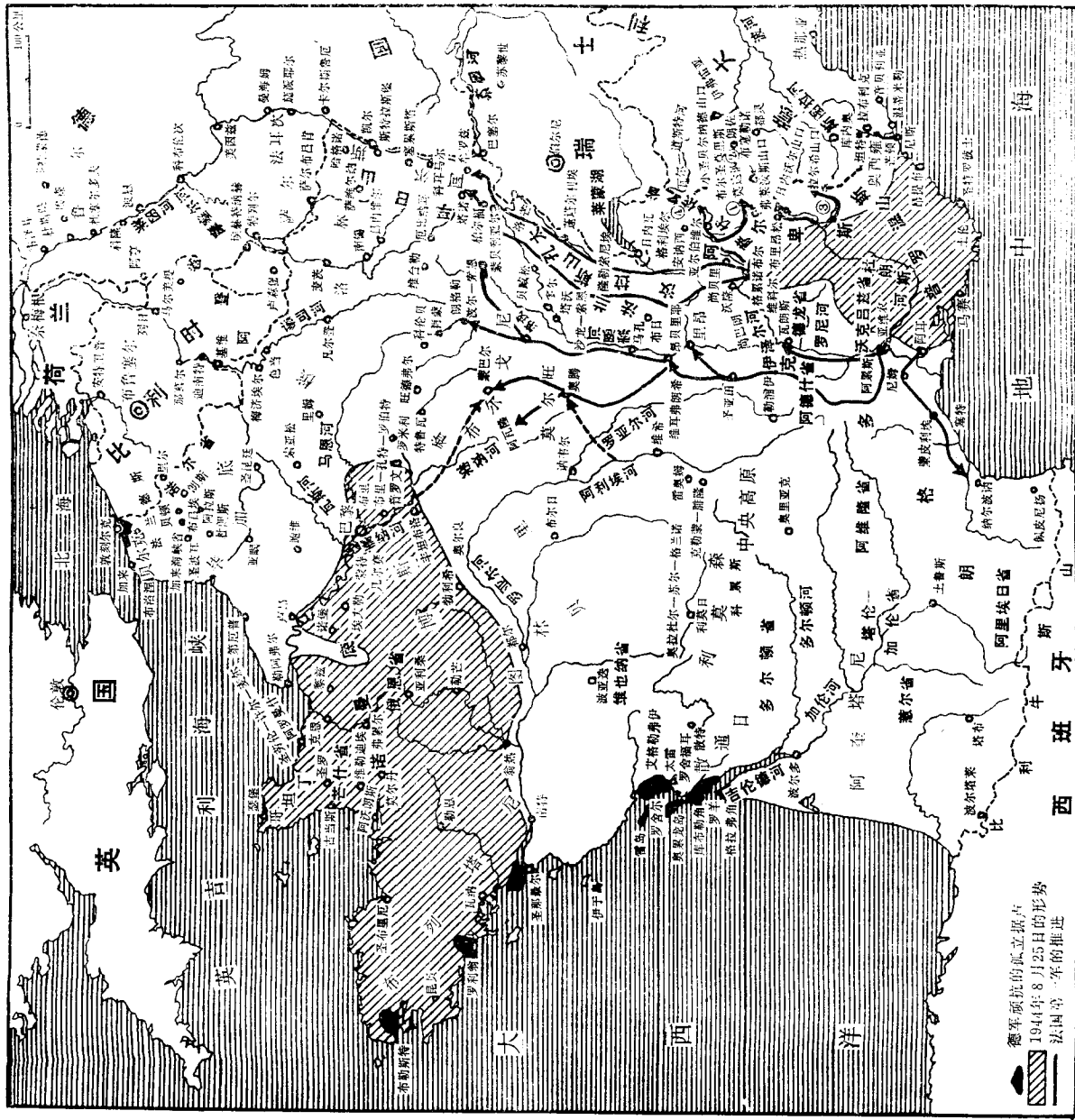
出版者说明

本卷从1944年8月戴高乐回到巴黎写起，到1946年1月他被迫下台为止。这一时期正是希特勒德国从继续节节败退到无条件投降，美英法等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问题上来，同时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激化的时期。戴高乐从他自己和法国的角度出发，在本卷中描述了这方面的主要问题。

戴高乐在本卷中说明了他如何处理国内各种武装力量及国内其它问题。在国际上，当时戴高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法国如何排除美英的阻挠而恢复大国地位，如何把英美势力从法国的殖民地和托管地赶出去。本卷对戴高乐在对德最后战役中设法扩大法军的战果以争取在对德问题上的平等发言权，对戴高乐分别同英美苏政府首脑谈判以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对法英在中近东地区展开的激烈斗争，都作了详尽的叙述。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查考，本卷的绝大多数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均照第一、二卷的译法。正文中许多同附录有关的部分，原文不一致，译文也各按原文译出。

本书这次再版，地图照旧版本刊出，另附地名新旧译名对照表，以便利读者参考。本书译文承蒙迎晖同志作了必要的校订，谨表谢忱。



德军顽抗的孤立据点
1944年8月25日的形势
法国第一军的推进

法兰西战役

① 伊斯坦布尔 ② 安卡拉 ③ 伊萨克帕夏

目 录

解放.....	1
地位.....	44
秩序.....	96
胜利.....	137
不和.....	194
分裂.....	250
卸任.....	290

解 放

解放的步伐极其迅速。盟军和法军在阿弗郎什打开缺口并在我国南方登陆以后，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就到达安特卫普，进驻洛林，深入孚日山区。9月底，除阿尔萨斯及其前沿阵地、阿尔卑斯各山口和大西洋沿岸的据点以外，我国全部领土上的敌人均已肃清。由于盟军机械化部队的打击和法国抵抗运动的到处袭击，德军迅速被驱逐出去，其速度比不久前它们占领我国领土时还要快。敌人只能在没有民众起义来扰乱其后方的德国边境才停止溃退。但是，潮水退下去以后，法国大地上的混乱便突然完全显露出来。

因此，政府在治理这样一个刚脱离痛苦深渊的国家的进程中所遇到的无数紧急问题，不仅压力很大，而且发生在最不容易解决的时刻。

首先，为了正常行使中央政权，政府必须能够了解情况，下达各项命令并监督其执行。但是，在若干星期以内，首都和各省之间还不能有正常的联系。无数的电报和电话线路被切断了，无线电台被破坏了。在弹坑累累的飞机场法国的联络机无法起落。铁路几乎全部不能使用。我国的一万二千台机车只剩下二千八百台。从巴黎开出的火车，没有一列能到达里昂、马赛、图卢兹、波尔多、南特、里尔、南锡；没有一列能跨过内韦尔至大西洋的卢瓦尔河、芒特至英吉利海峡的塞纳河，或者跨过里昂至地中海的罗纳河。公路桥梁有三千多座被炸毁；过去我们有三百万辆汽车，而现在只有三

十万辆勉强能使用；而且，由于汽油奇缺，乘坐汽车简直成了最不可靠的事。至少还要等两个月才能正常地传递命令和报告。由于没有正常的传递系统，政府只能断断续续地行使职权。

另一方面，交通的中断还打乱了供应计划。而粮食、原料、燃料和工业品的贮存又都完全耗尽。不错，阿尔及尔和华盛顿之间签订的“六月计划”规定要输入第一批美国物资。但是，我国的港口都不能使用，又如何实现这项计划呢？一方面，敦刻尔克、布雷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拉罗歇尔以及波尔多的海口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另一方面，加来、布洛涅、迪埃普、鲁昂、勒阿弗尔、瑟堡、南特、马赛和土伦，由于英美空军的轰炸和德国占领军在缴械以前的彻底破坏，现在都只剩下坍塌的码头，破烂的船坞，闭死的水闸，被漂浮物堵塞的航道。

是的，盟国正积极供给我国在鲁昂—里尔—布鲁塞尔和马赛—里昂—南锡两条战略轴线上修复公路和铁路所需的工具；着手帮助我国在北部、东部和巴黎附近修复飞机场；从科唐坦到洛林的输油管很快就要敷设；他们在建成阿罗芒舍和海滨圣劳朗人造港以后，正加速占领布雷斯特，排除使用瑟堡、勒阿弗尔和马赛港的障碍，以便在我国沿海卸下足够数量的物资。但是，运行的火车和卡车、着陆的飞机和碇泊的船只，主要都是供作战部队用的。甚至根据盟军司令部的紧急要求，我们还要把煤场中的一部分存煤供给它，答应它运用我们的能够开工的某些工厂，并且把我们仅有的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供给他们。因此可以想象，全国的解放并不会首先给我们这个支离破碎、被洗劫一空的国家带来任何物质上的方便。

但是，解放至少使全国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件渴望已久的事情现在突然从天而降了！四年来，群众在敌人占领的压迫下，一直保持的沉默心理骤然消失了！现在是什么景象呢？人们可以彻夜高谈，自由来往，随便行动！每个人不仅欣喜若狂，而且看到自己面前展现出原来连想都不敢想的美景。但是，法国人民却象重病刚好就认为健康已经完全恢复的人一样，一味纵情欢乐，似乎一切困难都已经过去了。这是一种只图目前安逸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开始产生种种幻想，以致很快就出现许多误解。

正因为如此，很多法国人把解放和战争结束混淆起来。他们把在敌人被打垮以前应该进行的战斗、承担的损失、忍受的限制都看作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由于未能正确估计我国遭受破坏的程度，我国极端贫困的处境，以及我国所承担的继续作战的繁重工作，因此他们认为，不要很久我国的生产就会大量恢复，供应就会改善，新的舒适生活的各种条件也会随之而来。人们把盟国看作埃比纳尔^①画像的样品，认为它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准备供给法国；人们还认为，盟国由于热爱法国才来解放它，并且希望它重新站在强国的行列中。至于对戴高乐，大家把他多少看成一个神话人物，认为戴高乐将军是神奇解放的化身，他一个人可以作出人们所希望的种种奇迹。

至于我个人，在风云变幻的夏末来到了悲惨的巴黎，我丝毫没有自己欺骗自己。我看到人们的口粮象度荒年一样，衣衫褴褛，凉锅冷灶，没有灯火；我曾在橱窗空空的商店、停工的工厂、死气沉沉的车站前面走过；我听到群众发的牢

① 埃比纳尔 (Epinal)，法国东部城市，以画像著称。——译者

骚和团体提出的要求，以及造谣惑众分子的兴风作浪；我清楚地看到，尽管各国人民都同情我们，但是各国都奉行一条铁的纪律：决不白白地赠送东西。所以，我们只有付出代价才能恢复自己的地位；我估计了为争取我们那一份胜利和完成初步恢复工作所应付出的代价。考虑到这一切以后，我决不可能抱有任何幻想，我个人更没有任何法术使全国不受痛苦就达到目的。但是，我一定要利用法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来拯救法国。第一步应该做的是：建立政权，把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的人都团结在我的周围，把来自法兰西帝国各地的军队和内地军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使全国重新开始生活和劳动，以免陷入可能引起的其他不幸的动荡之中。

必须自上而下地使政府全面着手工作。阿尔及尔的“委员们”，无论从“自由法国”时期就追随我的，或者以后在北非和我合作的，大部分仍将在巴黎担任部长。但是，各方面的情况提醒我，应该把留在内地的、献身于抵抗运动的其他人士吸收到政府里来。不过政府还不能立即进行改组，因为在职的部长们只能从阿尔及尔陆续回来。在他们中间，迪特姆、雅基诺、达斯迪埃、菲利普四个人正在视察第一军所属部队和南方各省。马西格里在巴黎解放时又返回伦敦，以便顺利地保持我国同外国的关系。普利文已经来到我身边。其他的人都要迟些时候才能动身。至于我从本土遴选的人，有几个刚刚离开地下活动，还不能马上来到巴黎。因此，到9月9日，也就是在我到圣多米尼克路以后过了两个星期，政府才重新组织起来。

新政府中设两个国务部长，由詹伦内议长和贾德鲁将军分别担任。前者是从敌人刚刚撤离的格勒诺布尔邀来的，他的任务是草拟共和国政权逐步恢复正常状态所应采取的措

施；后者将仍然同时负责穆斯林和阿尔及利亚总督府的事务。弗朗索瓦·德·芒东继续任司法部长，安德烈·迪特尔姆任陆军部长，路易·雅基诺任海军部长，勒内·普利文任海外领地部长，勒内·梅耶任运输与公共工程部长，勒内·加比唐任国民教育部长，保罗·吉亚科比任粮食部长，亨利·弗雷内任俘虏、迫迁人员与难民事务部长。另一方面，国民经济部由孟戴斯—弗朗斯负责，内政部由阿德里安·蒂克西尔负责，公共卫生部由弗朗索瓦·皮佑负责。有八个部由新近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人负责：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财政部长安德烈·雷贝尔克，空军部长夏尔·狄戎，工业生产部长罗伯特·拉戈斯特，农业部长弗朗索瓦·唐吉—普利让，劳工部长亚历山大·巴罗迪，邮电部长奥古斯丁·劳伦，情报部长皮埃尔—亨利·戴让。

另一方面，有八名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不再参加内阁：亨利·葛义是自动请求脱离的；勒内·马西格里将代替7月间因劳瘁逝世的维埃诺担任我国驻伦敦代表；亨利·庞奈将主持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馆务（美国终于承认该机构为使馆）；安德烈·勒·特劳盖已就任巴黎市议会主席；厄曼努尔·达斯迪埃——我原来希望能让他摆脱政治活动——拒绝了我交给他担任的外交职务；安德烈·菲利普性情暴躁，不适宜担任行政工作，所以免除了他的部长职务；费尔南·格列尼埃同样失去了部长职位，因为在维科尔战役时，他的党玩弄阴谋，使他在阿尔及尔公开采取与政府对立的态度（虽然他以后对此有所悔悟）；让·莫内任驻美经济谈判代表，自然不能在国民经济部成立之后再兼任国民经济部长。

我周围的二十一位部长起初感到工作漫无边际，无从着

手。因此，确定一个目标是非常必要的。1940年6月以来，我领导法国的目的是求解放，解放的手段是抗战。现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要求全国上下一致，共同努力。

9月12日，在沙约宫召开了一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全国抵抗委员会、各运动组织和通讯组织的领导委员会、市议会、国家团体、主要官员、巴黎大学以及经济界、工会、新闻界和律师公会的代表等，共计八千多人。这次大会给了我发表施政方针的机会。我在人们都沉醉于幻想的时刻，更觉得自己应该说明事实真相。

我在追述全国掀起来的“欢乐、骄傲和希望的浪潮”并向抵抗运动、盟国和法国军队致敬以后，便着重说明应当克服的困难以及必须进行的努力。不容许有任何贪图安逸、散漫松懈的情况存在！不容许有脱离政府、妄图干涉司法和行政的任何组织存在！我提出了不容易解决的“民兵”问题。我大声疾呼：“我们还在作战！”“在目前和以后的战役中，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参加。将来在占领德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为此，我国需要建立智勇兼备、战无不胜的大部队，参加内地军的热血青年将要并入这支军队……所有法国士兵都是法国军队整体中的一部分，军队应该象法兰西一样，永远是团结一致和不可分割的。”

在提到我国对外关系问题时，我也没有忘记强调困难，而不管那些只会幻想不够清醒的人会受到什么打击。我说：“我们愿意相信，法国参加结束大战和处理战后问题的权利终将得到承认，法国在对外事务中遭到的那种公然排斥，也将以恢复我国几世纪以来和其他大国一向保持着的正常来往而告结束……我们相信，在安排德国命运的时候，如果没有法国参加，那就不能就任何条款和规定进行讨论或通过，这

关系着人类的最高利益……我们认为，在决定任何有关欧洲的问题时，如果没有法国参加，那都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对于战后与全世界人民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就作出决定，那都是冒险行为，因为无论怎么说，还有一亿人口生活在我们的旗帜下……人类的任何重大事业，如果没有得到法国的同意，都将是非法的，因而也是不稳固的。”

决不是只恢复自己的地位就算万事大吉，还必须能够保持住这种地位。这件事情，特别是这件事情，决不会没有困难、不费力气就能实现。在描述我国所遭受的破坏和说明阻碍我国复兴的条件的同时，我宣布：“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解放决不容许我们有任何享受；相反，它意味着我们要继续克己奉公，并且要求我们付出艰巨的劳动，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还要服从严格的纪律。”我补充说，“为此政府必须作出必要的规定。”接着，我明确了政府所规定的目标，我说：“设法使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水平的上升而提高；通过征用或保管的方式把某些公共服务机构和企业的活动直接交给国家管理；没收投敌分子所拥有的罪恶财产；在生产和运输还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时候，规定物价和监督交换……”

毫无疑问，这是一些因时制宜的措施，然而它也符合抵抗运动在抗战时期梦寐以求的改革原则：“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国家巨大资源的经营和管理要有利于全体；永远消灭赢利联盟；总之，要使法兰西的每个儿女都能安全而有尊严地生活、劳动和教养子女。”

在结束讲话时，我向“参加抵抗运动的男女战士”发出了呼吁：“你们是佩带着洛林十字勋章的人，你们在争取法国的

荣誉和自由的战斗中是全国的先驱，你们今后的任务是把全国人民引向富强和伟大的道路。这样，并且也只有这样，法国才能获得伟大的胜利。”

我这次讲话并不是针对着未来提出一些意图，而是提出各个利益集团和各人要立即采取的若干措施。昨天，在伦敦或非洲，那还是将来要做的事情，而今天在巴黎，却是立即行动的问题了。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曾经鼓舞过自由法国的热情。阿尔及尔委员会拟出了纲领草案把这种动力变成具体的目标。可是现在，则应当制定政策以支配政府的行动了。领导人今后所无法摆脱的那些急迫而又互相矛盾的现实，是不是会把野心家和集团分裂成各行其是的派别呢？通过抵抗运动而终于实现的团结意识，在拯救民族以后是不是还能保持下来呢？沙约宫集会给我的印象，使我对这一点感到怀疑。

是的，在我走进会场就座时，在乔治·皮杜尔作了有力的致词以后我发表演说时，我的确是大家高声赞颂的对象。如果我只重视欢呼声，那我就会以为又回到了亚培尔大厅和布拉柴维尔团结一致的会场，仿佛又走进了阿尔及尔、突尼斯、阿雅克修的那种有和我心情相同的听众的会场^①。但是，我说不出这里的热情欢呼含有怎样一种不和谐的音调，那种掌声的配合、与会者的互递眼色和点头示意，以及随着我的发言而流露出来的表情，使我感觉到，无论新的或老的“政治家”的称赞都各有其微妙之处。在这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共同行动将会由于一些保留态度和一些条件而复杂起来。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不是依靠企图置身于我与人民之间的“优秀人物”。我的威望是解

^① 这里指的是戴高乐过去受到热烈欢迎的一些地方，本书第二卷中曾经提到。——译者